

I 英语大观

英语在全球的崛起是一部令人称奇的历史。近 2000 年前，即公元前 55 年，当罗马帝国大将凯撒（Julius Caesar）征服高卢人，登上英国海岸时，英语并不存在。公元 449 年，日耳曼民族入侵，岛上开始流行一种为现代人难懂的原始英语 *Englisc*，即盎格罗、萨克逊和朱特方言的混合语，使用者为数不多，且影响仅限于东南部。时光又过了近 1000 年，大约在公元 1500—1650 年的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鼎盛时期，说英语的人也不过约 500—700 万左右，其势力超不出英国本岛。但从 17 世纪开始，情况就大为改观，随着商人的贸易、民间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军队的移动和探险队的远征，英语及其文化逐渐向全世界蔓延开来。如今，说英语者至少有 7 亿 5 千万，其中以英语作为母语者将近一半。有人估算，讲英语者可能达 10 亿。无论总数如何，有一点已为世人所公认，即英语是世界语言中分布最广和口笔语使用最多的语言。实际上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语言。

为证明英语的国际地位，不妨列举一些统计数字。全世界约有近 3000 种语言，但词汇最丰富者当属英语。庞大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收容了约 500,000 词条，且还有几十万科技专门术语未编入。巨型的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也汇集了约 250,000 词条。相比之下，德语只有 185,000 词，而法语还不到 100,000 词（其中含称之为“英法混合词” [Franglais] 的约 35,000 个英语输入词，如 *les bluegines*, *le weekend* 等）。英语是公认的科技语言，世界半数的科技出版物是

用英语，世界计算机储存的信息有 80% 乃以英语为语言媒介。英语是国际通讯语言，世界邮件和电传、电报等有 3/4 是采用英语。国际航空业务的联络也使用英语，无论哪国的航空公司，其航空小姐必须掌握英语。国际体育运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选美大赛 (Miss World Contest) 也以英语为正式语言。世界上的英语广播电台数量最多，覆盖面最广，据说全球最大的五家广播公司 (CBS、NBS、ABC、BBC 和 CBC) 的英语节目听众和观众达 1 亿之多。

英语有一些竞争者，但还没有与之匹敌的对手。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皆为国际性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但缺乏左右世界的威力。俄语享有国际语资格，但其影响也仅限于境内和几个周边国家，况且也开始受到英语的侵蚀，俄英混合语 (Russlish) 的出现就是例证，如 *sekspil* (sex appeal), *noh-khau* (know-how) 等。德国和日本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堪称为强劲对手，开始觊觎语言大国 (language power) 的地位，但其语言也无不受到英语的冲击，形成德英混合语 (Deutschlish) 和日英混合语 (Japlish)，据说，日语中有 30% 是英语外来语。

英语的普及并非绝无仅有，其发展过程也象希腊语和汉语一样源远流长，但其崛起之快却令人瞠目。在近一百年间，除 3 亿至 4 亿人把英语作本族语外，一些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尼日利亚、新加坡等，已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用于行政管理、广播和教育上。在这些国家里，英语充满生机，如可选择的交际语言，起到了凝聚不同民族的作用。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后，印度政府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和防止暴力时，是用英语广播的。在英语非洲国家，夺权和政变也往往通过英语公布于众。英语作为外语也已在不少国家得到普及，如瑞典、荷兰、南斯拉夫、塞内加尔等。在中国，估计有几千万人学习英语，大中小学校把英语定为必修课程，电台与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英语教学节目。

一、世界通语

用一种语言沟通世界，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17 世纪末，人们开始产生全球意识 (global consciousness)。扎缅霍夫 (Zamenhof) 博士于 1887 年发明了 Esperanto (世界语) 继而又出现了 Interlingua (国际语)、Novial (诺维阿语)、Interglossa (语际语) 等人造语言。这些人造国际语只不过是促进各民族相互沟通的尝试，在现实交际中并无根基可言。

当代英语根基深，影响广，初步具备了沟通世界的作用，因之可称为全球英语 (global English) 或世界通语 (universal language)。但这种全球英语还有一种内在不和谐之音，即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并存。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语调 (accent)、尾变 (inflection)、拼写 (spelling)，特别是词汇 (vocabulary) 上，如 flat-apartment、mate-buddy、sweets-candy、nappy-diaper 等。表达方式的差异如此之多，美国合众社 (Associated Press) 和英国路透社 (Reuters) 还必须进行英文互译。路透社驻纽约办事处就编制了一份 12 页的常用词汇互译表。

英语的全球地位依赖于各种因素，如英语培训项目和出版物近年来，英语已成为英国最可靠的出口项目，其产品“无需工人和加工、无需传送带和组装，无需零配件，且极少维修，却能提供世界以最亲切而公开的服务。”牛津大辞典主编 Dr. Robert Burchfield 曾说：“地球上任何有文化和受教育的人若不通晓英语就是贫学 (deprived)。”

英语的全球性影响首先反映在其作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在世界各国或各地的应用。在印度，英语于 1947 年被宪法规定为副官方语言 (associate official language)；在新加坡，英语为政府、法律和教育的主要语言。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如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哈马、

波多黎各、伯利兹、多米尼加、菲律宾、斐济、冈比亚、圭亚那、加纳、津巴布韦、莱索托、塞拉利昂、毛里求斯、尼日利亚、赞比亚等。在一些其官方语言并非英语的国家，不少名牌大学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如埃及的开罗大学、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苏丹的喀士穆大学、智利的北方大学、中国的南京大学、伊拉克的巴格达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韩国的高丽大学、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土耳其的中东工业大学等。与法语、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相比，英语的跨文化传播更为深广。在尼日利亚，英语不仅用以办报纸和搞广播，而且服务于行政、学校、法院、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印度有 200 多种语言，但英语乃唯一能统一印度的语言，如今说英语的印度人比英国人还多。

另外，作为外语，英语也是全世界学习的语言。各国人民为进行国际交流，对英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诸如新加坡、日本、中国、菲律宾等国学习英语已蔚然成风。英语也是所有国际组织和重大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之一。各国重要新闻发布会几乎都以英语为主。当今世界用英语向报界发表讲话者也不乏其人，如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利比亚总统卡扎菲（Qadhafi）、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Aquino）等。法国前总统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西德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交谈时常使用英语。

世界贸易也是促进英语发展的因素之一。占世界总进口额 25% 的八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南非、英国和美国——均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由英美等英语国家控制的现代技术和银行业跨国公司也是英语得以扩散的动因。日本许多跨国公司，如 Nissan 和 Datsun 是用英语传递其国际公文（memoranda）的。Chase Manhattan Bank 是用英语向其三大洲的职员下达指示的。大石油跨国公司 Aramco 经常向其沙特阿拉伯的一万余名工人进行英语教育。不懂英语或英语

说不好的人，要想在一些国际大公司，如 IVESCO 谋职，是难上加难。

二、英语对各种语言的渗透

本世纪以来英语对世界各国语言的影响之大，渗透之深，令人注目，有人说，世界在英语化，也不无道理。有人诙谐地说：日本所有进口项目中，最大的一宗是英语词汇。日本历史上向来喜借外来语，先是葡萄牙语，后是荷兰语。二战后，英语词多方位地渗透到日语中，总数约达 20,000 多词。有人估计，现代日本语有 30% 的词语借用于英语。有些词乃直接借用，如 *inflight*、*input*、*influenza* 等，而且编撰了特别辞典，解释这些直接引用语，有些是英语与日语的混合语，称之为 *Japlish* 或 *Janglish*，为 *man-shon* (*mansion*)、*aisu-kurimu* (*ice-cream*)、*mai-homu* (*my home*)、*mai-com* (*my computer*)。电视中日英混合语也层出不穷，如一项夜间棒球节目叫 *Ekusaito Naita* (*Excite niter*)，另一项倍受青睐的歌曲节目名为 *Reffsu Go Yangu* (*Let's go young*) 日本最流行的通俗歌曲中前 20 首均冠以英语标题。

国际通俗歌曲和娱乐业常以英语征服观众，是世界英语化的另一个侧面。1982 年西班牙一支邦克 (*punk*) 摇滚乐队 *Asfalto* (*Asphalt*) 出版了一盘学习英语的磁带，立即成名。瑞典乐队 *Abba* 的所有歌曲磁带皆用英语录制。波兰歌手 *Michael Luszynski* 的歌曲几乎全用英语演唱。

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龙格 (*Magnus Ljung*) 曾对英语打入瑞典语作过这样的评述：由于观看英语电视节目，瑞典语已被“败坏” (*corrupted*)。瑞典人无可奈何地承认，他们开始用复数形式 *S*，而似乎忘却了本族语的 *or*、*ar* 和 *er*。瑞典语英语混合语 (*Swinglish*) 也应时而生 典型的有：*baj baj* (*bye bye*) 和 *tajt jeans*

(tight jeans)。

在香港 discotheque 变成 dixie-go。在德国,青少年喜穿 die Jeans,听 diesoundtrack (die 为德语定冠词)。俄罗斯莫斯科人喝上了 Visky (whisky) 和 dzhin in-tonik (jin-in-tonic),爱上了 dzhazz-saission。连西班牙最著名的 Castilian 辞典也收录了 whisky。

英语的全球攻势也可以语言大国法国的抗争窥见一斑。几个世纪以来,法语为保持其纯洁性,一直在抵御外来语的介入。70年代后各届总统都关心法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避免受英语侵犯。1970年前总统蓬皮杜操办了“术语委员会”,千方百计地把 Franglais 从政府、电台、学校中挤出。他也毫不服气地说:“我们不应屈服这种思想,即只有英语才是工业、经济和科学交流的唯一可能的工具。”但他挤掉的仅有约 350 个词,绝大多数英语词(特别是源自美国的)却留存下来,像 le grand rush, le snacquebqrre 等。后来的德斯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也都相继采取措施,以阻止“可口可乐语言”(la langue du Coca-Cola)的传播,并发明了适当的法语词来替换英语外来词,如以 capitaux f'ébriles, gros porteur, prêt-à-manger 来分别替代 hot money, jumbo jet, fast food。尽管如此,像世界报(Le Monde)这样的大报中,166个法语词中仍有一个是英语词。有人估算,法语日常词语中有 1/20 为英语词(anglicism)。

往往被人忽视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的英语。由于英语为一种混合语(hetereogeneous language),它特别容易被洋泾浜化(pidginized)。非洲一些国家所说的就是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或不完整英语(broken English)。据统计,讲这种英语的有:乌干达(1,300万)、喀麦隆(800万)、赞比亚(600万)、津巴布韦(750万)东南亚地区洋泾浜英语亦很盛行。据说,pidgin 一词本身就是汉语读音之讹,甚至在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像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讲这种不纯正的英语。正因为

如此，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 (Seaka Stevens) 曾就本国英语教育的实际意义解释说：“如果你想每天有面包可挣，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英语。这就是大多数职业的来源。”

三、英语标准化问题

近年来，随着英语热的出现，随着其在世界上的普及，人们更为关心掌握什么样英语的问题，是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还是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究竟以哪种方言为标准，供人们，特别是第三世界，学习和作为楷模，这极为重要，但也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论。

在整个英语历史上，不论涉及口语，还是书面语，一直存在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和方言化 (localization) 之争。18 世纪，在规范语法学家的影响之下，一些辞典学家，如贝里 (Nathaniel Bailey) 和约翰逊 (S. Johnson) 为使英语永远地“纯正化”编撰了一批像样的英语辞典，开始了英语标准化进程。在维多利亚时代，语言规范化概念逐渐深化，于是形成了所谓的“标准英语” (Queen's English)，成为草民 (lesser breeds) 模仿的样板。然而由于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局限性，还存在大量地区方言，而且影响很大，恰似印第安语的一句谚语所说的：“每走 18 或 20 英里，语言就会发生变化。”在英国，驴子 (donkey) 可有 *moke*、*cuddy*、*nirrup* 或 *pronkus* 等不用方言称呼。在英国湖区，*deg*、*frap*、*geft*、*joggle*、*nope*、*scaitch* 和 *whang* 都意味着 *to beat*。地区方言虽不如以往那样兴盛，但其作用仍不可低估，多赛特 (Dorset) 牧羊人与艾伯丁 (Aberdon) 农夫的对话，仍可能是一对聋哑人之间的交际。

19 世纪初，农村人口大批流入城市，工业城市，像兰克郡和布莱克郡，一个个兴起，教育和文化水准都逐步提高，促进了书面语的标准化，并使之得到普及。工业革命意味着道路、运河、

火车的畅通，使人们的旅行和交往更为频繁，从而打破了地区的封闭性，使其方言被逐步中和。方言的淡化还有其社会原因。英国乃等级鲜明的社会，而言语又往往成为每个等级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象征，因此，人们十分看重谈吐，并以此判断说话者的身份和教养。就此，萧伯纳（G. B. Shaw）曾有句名言：“英国人不可能张嘴说话而不被其他人所鄙视。”这种阶级偏见和语言上的欲望迫使人们去学习一种有教养的、较规范的言语，无形中加速了一种标准化口语的形成，即“标准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或 RP）。

RP显然属于职业中产阶级，是与帝国公务员制度及其教育基础结构同时兴起的。1870年宣布了“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自此确立了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作为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语言的熔炉（melting-pot）作用，从而带来了英语预备学校的繁荣时期。此后，社会各阶层——农村绅士、城市贵族、军官、帝国公务员、律师、医生、牧师——都争先将其子女（8—18岁）送往公立学校攻读，为英国言语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奠定了深厚的教育基础。

然而，“教育法案”实施前，英国基本上是方言的天下，连有教养的特权阶层都有相当的言语差异，不少名流说话都带方言和乡音。有名的保守党首相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从不掩饰其中部口语；政治家兼探险家格莱斯登（William Gladstone）上过伊登中学和牛津大学，但始终未改掉具兰克郡喉音；甚至在伊登中学，著名诗人斯文本恩（Swineburne）的导师之一、牧师乔伊尼斯（Reverend J. L. Joynes）把 died 发成 doyed，把 idle 念成 oidle。对于“土音土调”，人们当时习以为常，即使出自大人物之口，也并不十分在意，并不会去嘲讽和非难。

到19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新教育体制下，学生若把 like 发成 loike 会遭到老师们的批评。纠正乡音或地

方音不仅被学校视为己任，而且变成一种社会风气。在学校，说话带土音，会受到来自其他同学的压力，会“被人无情地模仿和嘲笑。”于是，聪明者便开始自觉地学起标准英语，一些心气高的父母害怕把子女送到会“粘上土音”的学校。非标准化英语已被视为缺乏教育的标志。大学生若要被社会接受，必须会说 RP, 或 Queen's English 的特定语音语调。于是，这个术语就被沿用下来。

这种 RP 以伦敦和英国东南部有教育素养者的语音为基础并非新鲜，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就曾认为：宫廷语音和伦敦及其郊区的语音是英语最理想的语音。只不过以法案形式作后盾，由学校向社会全面普及，确属首创。为此，1917 年英国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 Jones）曾把这种标准语音称之为 PSP, 即 Public School Pronunciation（公立学校语音）

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RP 被整个殖民地视为权威之声，集权力、教育和物质利益为一体，因此，人人争学 RP, 一些有抱负者，一些有心向上爬并志在挤入上层社会者，也都千方百计掌握 RP。但这种渗透着浓厚社会意识的语言现象也使一些人很反感，他们讨厌其背后潜藏着的势力眼心态。因此，可能出于某种逆反心理，又问世了农村和工人阶层中的语音标准。然而，无论如何，RP 依然不失为当今英语的一种主要语音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声音成为时代的主调。美国凭借其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优势，通过其电影、出版物、新闻媒介、海外驻军、商业公司（如 IBM、Ford、Shell 等）以及种种驻外机构，保持了英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把英语大旗从黄昏帝国——不列颠手中接过来，并更有力地吧英语推向世界各个角落。

英语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其实在全球战争的非常时期就已经开始。随着美军转战东西，其生动而略显粗俗的语言也流往海外

各国，并从交战国那里吸收了一些词语，如德语的 blitz(闪电战)和 flak(高射炮火)。战后和平时期，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深深地卷入了欧洲经济，并随之向各国倾销了美国词语，如 black market(黑市)和 nylon(尼龙)。一些新词语也应运而生，如 pin-up(指挂在美军兵营里的姑娘照片)。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出现了一系列新词，如 fire ball(核爆产生的火球)、mushroom cloud(蘑菇云)、test site(核试验场)、fallout(散落物)、chain reaction(连锁反应)和 atomic holocaust(核武器大屠杀)等。日本战败后，全面地受到美国控制，美国生活方式深入到日常生活，美国名牌产品进入日本的千家万户，如 Marlboro(香烟)、Budweiser(啤酒)、Kodak(胶卷)等。日本人吃上了美国 Kellogg 牌 cornflake(玉米片)饮上了 coca-cola(可口可乐)。日本人对美国的这种商业侵略也心怀不满，故称其为可口可乐式殖民主义 (cola-colonialism)。由于日本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依附关系，在此期间从美国英语中“进口”了约 20,000 余词。

50 年代，随着美国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上的发展，美国英语在历史上首次出台(当然，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门肯关于美语的论述也不无影响)。Voice of America (VOA) 开始用美国英语向全世界播音，揭开了与 BBC 分庭抗礼的时代。当时，电视通讯技术也发生了飞跃，于是，电视与电影联手把美国英语和美国生活方式推向全球。Hollywood 电影城利用其先进技术出版了大量娱乐性和观赏性强的影片，外国人不少还是通过这些影片开始接触美国英语，据说，许多美国移民的英语最初也是从电影上学的。电影对推广美国英语的作用无法估计，而这种作用又因电视节目和广告而大大强化。一位广告商曾这样描述广告对美国英语的推销功能：“关于美国生活，或至少关于美国生活的民间神话——那种美好生活，自由自在的说笑，人们在酒吧和鸡尾酒会上的悠闲自得——的描绘，看起来令人神往……由此，不仅使美国生活方式

60

展的几大因素 —

大众传播文化 —

的又一场“词爆”，诸如 defoliate（化学除叶）、firefight（炮战）、gunship（武装直升飞机）、medivac（medical evacuation）（医疗撤离）、wind-down（递减军事义务）、airmobile（空中机动的）、frag（炸弹炸死）等，通过传播媒介迅速传遍英语世界。有些词出于政治家的如簧之舌变得走了样，按语言学说法，增添了新义，如 escalated（上）worsened（战争恶化或升级）；pacification 并非绥靖政策，而是消灭村落中的人民抵抗力量；战争死亡人员被委婉地称之为 inoperative combat personnel

裂成 hawks（鹰派）和 doves（鸽派）和 the silent majority（沉默的多数）和 the vocal minority（反战的少数），如同尼克松总统 1969 年 11 月 3 日的演说：“If a vocal minority ... prevails over reason and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this nation has no future as a free society. And so tonight—to you,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of my fellow Americans—I ask you for support.”

美国广播系统一直是传播英语的有力和有效工具，像 BBC 以 RP 为标准语音一样，它也发展了美国英语的语音标准，即广播网标准语音（Network standard）。这种语音是在南方英语或得克萨斯英语或布鲁克林英语语音基础上修改而成，特点是清晰、易懂和适中，为大多数美国人所欣赏。著名播音员拉扎（Dan Rather）就说这种语音。但它并非唯一的标准，如同 BBC 的 RP 伴以较有广泛基础的伦敦东区土语（Cockney）一样，它与美国中部英语（Mid-American English）同时使用，后者也有广泛的根基，较之前者鼻音更浓，听起来更悠闲和冷峻。操这种英语的多为社会中低层的蓝领工人。兰登书局大辞典（*Random House Dictionary*）

主编弗莱克斯诺 (Stuart Flexner) 对美国英语作过有趣的预见：“我们美国人依然在国内到处游移。当东部人和中西部人继续移往阳光带 (the sun belt) 时，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的地方言语模式将会淡化；当人们舍弃大城市搬进小城和农村，方言小区往往会萎缩或消失。将来或许有一天，地区方言将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只有两种方言：城市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方言和农村穷苦美国人的方言。”

广播网标准英语，不像英国的 RP，几乎无阶级内含。浓重的乡音并不妨碍有志者挤身于华府。一些美国总统并不在乎自己的乡音。据说，林肯的发音就夹带着“荒野的气息和木屋的味道。”他把 idea 和 really 发成 idee 和 ra-a-ly。哈佛出身的罗斯福就有纽约移民的语调，他常拖音，如 “Mister Speakah! Mister Speakah!” 曾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威尔森说话干巴无味，学究气足。杜鲁门的语调就是密苏里人的那种平淡而坚定、并带鼻音的典型语调。艾森豪威尔持有惯常的中西部声调。肯尼迪说话透着波士顿爱尔兰人的口味，而卡特言谈中总散发着乔治亚老家的土气。美国总统中只有里根讲典型广播网标准英语，因此他被冠以“伟大传播者” (Great communicator) 之美称。

另外，加利福尼亚语音亦不可忽视，它对美国英语有相当的影响。该州人口众多 (2千5百万)，经济和高科技发展居众州之首，而且由多种族组成，因此令 Californian English 使用者在英语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硅谷计算机工业所创造的语言 (computerese)，如 interface (接口) online (联机的) data-processing (数据处理) to access (存取) 等，往往会迅速普及开来，并被列入词典。

四、英语的现状与前景

英语像世界所有语言一样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尤其在社会和文化变革空前迅速的本世纪，这种变化更令人眼花缭乱。但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是旺盛生命力的表现，还是衰败或退化的征兆？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焦点。1987年英国上院对英语现状开展过专题辩论，与会者除一人外都异口同声地断言：英语在退化。他们抱怨英语用法每况愈下，并列举了一些像 *parameter* 和 *hopefully* 等词常被误用的例子。他们对语言中出现的像 *ongoing* 和 *viable* 这样的怪物兴师问罪。他们对旧词增添贬意更是牢骚满腹，有人悲叹道：现代诗人几乎再不可能写出像 *the choir of gay companions* 这样的诗句（因为 *gay* 一词的当今流行意是同性恋）。

英语是否在退化和衰亡，暂不下断语。然而，当代英语中的确存在大量“病句”和“病词”，委实令人不安。纽曼（*Edwin Newman*）在数百页的《严格地讲》（*Strictly Speaking*）一书中，曾以摘自报刊、演说、小说和口语的语料为基础，对几种“流行病”（其一矫揉造作；其二画蛇添足；其三时髦语泛滥；其四滥用俗语；其五措词的随心所欲等）及其“病理”进行了剖析，在英语界掀起轩然大波。

此外，现代英语中还存在着某些“公害”。其中之一为行话。这种语言一般限于特定行业，对外行人来说，多用会令人费解。为达嘲弄之目的，有人曾以现代行话模拟了福音书第 23 的几句诗：

1. The lord is my external—internal integrative mechanism.
2. I shall not be deprived of gratifications for my viscogenic hungers or my need dispositions.
3. He motivates me to orient myself towards a non—social object with affective significance.

4. He positions me in a non-decisional situation.

5. He maximizes my adjustment.

当然，在科技时代使用与其有关的行话，本不足怪，但结果往往会使语义含糊、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如在水门丑闻中，新闻发布官基格勒解释白宫谎言时说：“All previous statements are inoperative”。更有甚者的，是一种委婉性行话，即为哗众取宠而采用的一种迷惑性和兜圈子的语言，如白宫把空降入侵格林纳达形容为“pre-dawn vertical insertion”，再如把经常发生的核事故说成为“normally occurring abnormal occurrences”。委婉性行话还有 experienced car (second-hand car), therapeutic misadventure (hospital death), involuntary conversion (aircrash) 等。加里福尼亚州似乎是这类用法的当然产地，如在圣何塞，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变成 the Department of Human Performance。

对现代英语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两种评价或两种态度：一种是批判或否定；另一种是宽容或顺其自然。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纽曼 (Edwin Newman) 沙菲尔 (William Safire) 和西曼 (John Simon)。他们以捍卫“纯正”英语为旗帜，对语言中的种种“病患”和“歪风”给予口诛笔伐，在语言界多次掀起激烈论战。纽曼无情地鞭笞了诸如罗嗦、累赘、造作、滥用、误用、晦涩等不良文风；沙菲尔俨然以权威自居，在大报上独辟专栏，对词语用法和含义常常发表尖锐的意见，大凡脱离“规范”者都难免受到他的嘲讽；西曼对语法新潮派虎视眈眈，对想捞快钱而粗枝大叶的小作家毫不手软，对官场英语 (gobbledegook) 更是嫉恶如仇。他们通过传播媒介散布了对变化着的英语的深切忧虑，震动了公众对语言的感知，在英语界影响极大。单说纽曼一书的书名“Strictly speaking — or Will American be the death of English?”便足以说明其观点不容等闲视之。

总之，他们指责偏离“正统”和“规范”的倾向，实际上旨

在提醒人们：英语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目前他们的观点仍很吃香，其著作也很抢手。对此，语言学家盖赫（A.R.Gere）曾提出三种解释：（1）人们对英语发展向来没有过共识，往往被异化心理所左右，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批判态度；（2）人们在语言上受习惯控制，常趋向于保守，对新的变化有反感，在有地位、有教养者中这种心态尤为显著。《美国遗产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曾组织 136 名作家和语言学家（包括 Isaac Asimov, Theodore Bernstein 等）对有争议的 to finalize 和 insignias 进行评议，结果前者有 90% 反对，10% 赞成，而后者有 56% 接受；（3）社会上某些阶层，如政治家和广告商，把英语作为迷惑或诱骗公众的工具，以达宣传和推销之目的。美国一个叫作 Committee on Public Doublespeak 的机构每年都能发现大量有关证据，如把 neutron bomb 和 napalm 说成 anti-personnel weapon 和 selective ordnance，著名语言学家布林格（Dwight Bolinger）在《语言——上膛的武器》一书中曾把这种花言巧语、故弄玄虚的语言现象称之为“语言污染”（language pollution）。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公众关心并主宰语言，不能任少数人或集团（如新闻机构）垄断。

“语言退化”究竟谁之过，似乎说法不一。保守派认为，问题主要出自每况愈下的教育水准，学校培养的多是些“功能上的文盲，除非教育家们重新回到三 R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上，否则下一代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拼了。英国贵族也把英语的危机归咎于教育，指责学校不鼓励儿童和学生攻读语法和经典著作。另一种说法是，声像传播媒介的出现促使语言学家致力于口语，而不是书面语，而口语又是如此丰富多彩，很难有统一而严格的标准，这样，久而久之，规范就越来越松散。最有争议的说法，是把罪过算在普通人头上。西曼把人群分为有文化素养的和无文化素养的，并把后者比作语言“带菌者”（carrier of disease），其中特别是黑人、印第安人、青年、女权主义者等。语言现实派

认为，“语言退化”论是否站得住脚暂且不说，因为语言是社会产物，任何变化，哪怕是一些偏离，均属历史发展之必然。而把种种“语病”归咎于平民百姓更不公平，语言乃全民所有，任何阶级都有使用权。即使是欠规范的言语，也总是客观现实，无须多加指责，自然法则定会去粗取精，一切都应顺乎自然。况且，语言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病态的，哪些要扶植，哪些要避免，都必须受时间和实践检验，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能由少数大师武断决定。

其实，关于当代英语状况的论争，也是英语史上两种观念长期论战的继续。保守派总是力主语言的规范性（prescriptive）和纯正（pure）；而自由派总是强调语言的求真性（realism）要对其进行客观描述（descriptive）。论争可能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但无论谁胜谁负，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英语将不以任何人的意愿发展着，变化着，永远不会停顿。

II 英语的特点

英语在世界上分布如此之广，使用者如此之多，出版物如此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究其原因，主要是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亦不能忽视英语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掌握、普及、流通，乃至欣赏英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试想，若其词语贫乏，结构繁复，表达力疲软，音调呆板，它何以能在当今的语言交际中起主导作用？1977年9月5日美国宇宙飞船旅行者一号（Voyager One）在离开地球远征木星（Jupiter）之前，科学家曾使用了55种语言灌制了地球人的问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曾代表全世界147个国家作了一小段声明，所使用的语言，正是英语。

然而，英语并非自古至今一直炫耀于世，希腊语、拉丁语、法语、俄语都曾显赫一时。关于俄语，18世纪俄国诗人兼物理学家罗蒙诺索夫曾说：

“俄语乃众语言之至尊，大大优越于欧洲所有语言。这不仅表现在它主宰的国家之广，而且也在于它的丰富和无所不包。神圣罗马皇帝曾说‘一个人对神应说西班牙语；对朋友应说法语；对敌人应说德语；对女人应说意大利语。’然而，一旦他通晓俄语，便无疑会补充：对一切人或神都可说俄语。人们会发现，它有西班牙语的庄严，有法语的生动，有德语的刚健，有意大利语的甜美，而又有自身形象的活力和鲜明，加之希腊和拉丁语的丰富。”

且不说这位伟人之言是否夹杂着语言沙文主义（language